

郭大顺:与“女神”见面的情景至今难忘

本报记者 吴 限

核心提示

几十年来,一代代考古人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不断地找寻、发掘,将红山文化的神秘面纱渐渐揭开。从梁思永到苏秉琦,再到郭大顺及目前正在田野调查的考古工作者,他们的故事也许并不精彩,但正是他们的执着和认真,红山文化遗址才得以发现。今天,我们重拾几段记忆,重温考古发掘中的那些有趣的事。

梁思永:最早考察红山文化的中国人

1930年冬,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通辽起程,经过天山(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林东(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到达林西(今赤峰市林西县)。这个最先触碰到红山文化的中国人就是梁启超的二儿子、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

早在二十世纪初,日本、法国的学者就在赤峰一带盗掘,发现6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30年8月,梁思永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有人在内蒙古林西一带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就在梁思永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带暴发严重鼠疫,把从北路进入热河的路口阻断。在进退两难之际,从东北传来另外一个信息:有人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梁思永立即打点行装前往那里。9月28日,梁思永到达发掘现场,工作3天之后,因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有着强烈责任心和责任的梁思永,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取道通辽,南下热河。

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林西。他下决心准备在林西县做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以解决这些遗物在地下的分布问题。

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拉海”,这是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过,位于大道西侧的钢碾子山高高耸立,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识。由于天气寒冷,梁思永只得将发掘计划改成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采集。

梁思永对英金河北岸和红山嘴一带的新石器及较晚时代的遗址进行了调查,收获了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对该区域古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1930年11月27日,梁思永回到北平,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梁思永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断。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

发表。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时代文物的文字。在报告里,梁思永无限伤感地写道:“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东北4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这也正是中国人“国破家亡,著我河山”的情结与担当。

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撰写了学术著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请梁思永作序。梁思永看了尹达的作品后,建议把赤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篇幅很短的论考,在这一篇论考里,尹达写道:“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含有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文化遗存,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从此,“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而此时,梁思永已经因病去世一年多多了。

发现东山嘴遗址,出土了“妇女小雕像”

在先后主持过东山嘴、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的郭大顺家的客厅墙上,挂着导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写的一首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豕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28个字,把中华文明的“龙”“花”渊源和相互交融概括得淋漓尽致。

郭大顺虽然已经年逾八旬,但是一开口,他清晰的思路 and 眼神中跳跃的光芒,让人根本无法将这个思想深邃、温和文雅的学者与“老者”二字联系在一起。

郭大顺在北大学习期间,师从苏秉琦教授,专攻新石器时代考古,并深入洛阳王湾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和江浙地区实习。苏秉琦是郭大顺的恩师,是继梁思永之后对红山文化贡献最突出的一位学者,也是第三代红山文化考古人。

1968年,郭大顺从北京大学历史系

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被誉为“考古不出关”的辽宁,当时的辽西还被视为古文化的偏远地区,就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来说,文献记载很少。然而,郭大顺以一个考古人的敏锐,隐隐约约感到,那片因干旱而龟裂的红土里,一定埋藏着秘密。

1979年5月,辽宁省文物普查工作开始,郭大顺作为喀左队队长,与17名队员一起把全县21个公社跑了个遍。为了摸清情况,他和同事们经常是几个月不回一次家,最终在喀左境内的大凌河畔,一个名叫东山嘴的高岗上,以地上散落的陶片为线索,展开发掘。

朝阳是红山文化分布区,但红山文化出土的文物还是凤毛麟角。因此,队员们在普查时格外仔细,共发现各类遗址609处。1982年,在喀左东山嘴发掘中国古代第一个祭祀遗址,出土了两尊“妇女小雕像”。通过碳14考古测定,确定这个遗址是距今

54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

东山嘴遗址的考古发掘很快轰动了中外考古界。1983年7月20日,以郭大顺的导师苏秉琦为首的国内19位知名考古专家来到东山嘴遗址进行现场考察。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我国史前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留学生们经常问起,世界各地的史前文化到青铜文化,到处都有妇女小雕像发现,为什么中国没有?有了这两天的见闻,才知道大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全国考古界等了30年才发现的重要材料。这就是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妇女雕像,以及同这种雕像有关的一片祭祀遗址。”

苏秉琦指出,东山嘴遗址对研究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古文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鼓励辽宁的专家要在喀左、凌源、建平交界处一带下更大功夫,并且预言,这一地区还将会有重大发现。

村民收藏的小“笔筒”引出牛河梁遗址

“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捡破烂的,手里还经常拿着盆盆罐罐……”郭大顺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考古界用这句顺口溜自嘲。郭大顺就是凭借一个“笔筒”发现了牛河梁遗址。在他眼中,考古就像破案一样,实际上考古挖的不是宝,是文化的宝藏。

郭大顺回忆说,那是1981年,辽宁省文物普查工作在建平展开。时任朝阳市文化局局长的宫殿东来到县城,集中全县32个公社文化站站长到县城进行培训,由郭大顺授课。课间休息时,富山乡文化站站长赵文彦提供了一条消息:该公社马家沟村村民家藏有一个“玉笔筒”。培训班结束后,郭大顺、赵文彦与建平文化馆专职文物干部李殿福,骑自行车赶到县

城以西8公里的富山马家沟。在马家沟生产队队长马龙图家,郭大顺一进屋就看到了柜面上摆放着一个似笔筒又不是笔筒的筒状器,里面还真插着几支笔。郭大顺上前拿起“笔筒”仔细端详,心里非常激动:这哪里是“玉笔筒”?这正是考古人员在辽西苦苦寻找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最重要的一个器型——斜口筒形器。征得马龙图的同意后,郭大顺一行带走了这件玉器,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

这件玉器是从哪里找到的?根据马龙图和其他村民提供的线索,郭大顺等人来到牛河梁山岗上。这座山位于公路101线南面、锦承铁路的北面,东西方向处在凌源与建平交界处,地表散布着红山文化的泥质红陶和彩陶

片。承包土地的村民说,村民种地时,还捡到过像“万”字形的石片,因已经破碎就扔掉了。这些重要的遗物,使郭大顺等考古工作者毫不怀疑地确定,这里是一处红山文化遗址。接下来的几天,考古工作者集中在这块台地上找宝。果然,在一条沟边老百姓捡石头的地方露出了人骨,做了简单整理后,居然清理出一座墓葬。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最初过程,也是红山文化第一次明确发现的墓葬。随葬还有白色玉环饰1件,这是红山文化玉器在墓葬中首次正式发掘出土。这一发现,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面世拉开了考古大幕。

(本文图片由辽博提供)



1983年秋,“女神”头像出土情景



1987年,郭大顺(中)陪苏秉琦(右)考察牛河梁



1986年,考古专家在观摩红山玉器(左二为苏秉琦,右一为郭大顺)



年轻的梁思永

史记 SHIJI

那一刻,我与“女神”邂逅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哪一项都极重要,但是,如果问我哪一项更为难忘,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女神头像。2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当说到发现女神像的过程时,郭大顺的眼睛一亮。

1983年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由孙守道和郭大顺担任领队,方殿春、魏凡、朱达、张星德等参加,开始了对牛河梁遗址的正式考古发掘工作。

郭大顺回忆,那是秋季的一个黄昏,夕阳的余晖将辽西建平、凌源两县交界之处的牛河梁染得一片赤红。北梁主山上,大家已经进行了一整天的考古勘察工作,有些疲劳,便在牛河梁第一道山梁处的山岗上坐下来休息并准备返回住地。与此同时,一同参加调查的富山乡文化站站长赵文彦独自一人来到离山岗最近的一条沟岔里方便。突然,他发现地面上露出一块红色的陶土块。于是,他蹲下去用手扒拉,越扒越有发现,他不敢再深扒,马上跑回驻地将这—发现告

诉大家。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和兴奋,一下冲到了这条沟岔,俯下身来,仔细探寻,唯恐丢掉什么。更多的陶土块露了出来,更惊喜的是,捡到了陶塑的耳朵、鼻子……

此时,夕阳西下,牛河梁洒满红霞。考古队员怀着企盼回到住所,一夜无眠。

很快,迫不及待的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这一地点试掘。表土去掉,露出了一座由主室、左右侧室、北室、南室连为一体的多室布局的房屋。房屋为半地穴式,从炭化的木柱、陶器分析,它是被一场大火烧毁的,地上部分全部坍塌,只保存了地下部分。考古工作者仅动了一下表面,出土的文物就令人眼花缭乱:仿木的建筑物构件、壁画、陶器、相当于真人3倍的残耳和残鼻……那么,有没有较完整的塑像呢?

终于有一天,大家屏住呼吸,围在一起看看队员们正在剥离一件特殊的塑件。渐渐的,额头、眼睛、耳朵、嘴……一尊几乎完美的女神头像瞬间展现出来,只见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语。摄影师及时按下快门,记录了轰动考古界的女神与其子孙跨越千年的相视一笑。(见主图)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郭大顺一直在做考古工作,田野间、遗址里、古墓中到处都留下他跋涉的身影。他说,有关红山文化还有太多的谜团等待破解,“发现了不等于认识了,认识的过程可能更艰巨,甚至更痛苦。”为此,在不断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新说,写了系列论著,由于他的执着和努力,现在,红山文化已经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他也因此被称为“红山文化第一人”。

已八十高龄的郭大顺经常教导年轻的考古人:考古资料是无字书,你要一页一页地翻好它不至于翻乱,就要掌握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他说:“有些重要考古现象,一瞬即逝,也可能一瞬即逝。功夫都在于平时的积累,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田野第一线随时保持学术上的敏感。”

彩云长在有新天

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的要求,把忠诚可靠作为第一位的标准。

总书记还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战线作风建设,强调要坚决纠正“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调查研究,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让党的旗帜在宣传思想战线高高飘扬。

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进一步提升广大宣传思想干部的本领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为紧迫。

“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干部提出的殷切期望。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宣传思想战线善学善做、敢想敢干,把握正

确方向导向的能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的能力、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能力、加强网上舆论宣传和斗争的能力、处理复杂问题和突发事件的能力不断增强,向着“本领高强”目标不断迈进。

2019年10月10日,党中央决定,追授黄文秀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作为宣传思想战线的普通一员,黄文秀生前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却不幸遭遇山洪献出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

用生命坚守初心使命的黄文秀,是宣传思想战线践行“四力”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对其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号召广大党员、青年同志以她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战斗力需好作风,好作风出战斗力。

对于宣传思想战线增强“四力”,习近平总书记还有诸多精准指导:

把握导向——在《读者》编辑部考察时,总书记要求“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在坚守主业基础上推动经营多元化,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扎根人民——在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时,总书记勉励大家“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

启迪心灵、催人奋进。1300余名记者参加,累计跨越16000余公里,推出10000余篇报道……2019年8月18日,“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在甘肃省宁远县圆满结束。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为活动点赞,强调其“对阐释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创造着无愧于历史的崭新业绩。”

在更广阔的视野内,宣传思想战线的作风面貌不断转变——

讴歌塞罕坝几代造林人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创作剧本7年多,实景拍摄1年多,取得良好口碑;民族歌剧《沂蒙山》剧组多次赴沂蒙老区体验生活,把歌剧艺术的根深深扎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中;深入偏僻山村,思政课教师将“大道理”转化为“小故事”……

坚强的队伍在践行“四力”中淬炼,优秀的作品在扎根人民中绽放。伟大时代成就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推动伟大事业。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看吧,960多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春潮涌动!听吧,近14亿中国人民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铿锵有力!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宣传思想战线正以新的气象、新的作为,积极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锐意改革创新,为时代铸魂、为人民立传、为梦想放歌,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创造着无愧于历史的崭新业绩。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上接第七版)

乾隆皇帝曾题写过一块“旰食宵衣”的牌匾,用来激励自己勤于政事。

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探访越南胡志明故居,以此讲述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旰食,指的是半夜才吃饭;宵衣,天没亮就起床穿衣服工作。真正能做到的还是为伟大事业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才能赢得民心、赢得胜利。”

脱贫攻坚,是中华大地上最精彩的时代故事。

2019年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幸福中国”单元脱贫攻坚倒计时显示屏前,习近平总书记告诉各国领导人:“我们的脱贫按小时、按分秒计算。”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正向世界展示着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019年9月,“中国好故事”数据库上线。这个集纳了6万条中国好故事的线上平台,很快成为展现“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载体。

(七)

“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要有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2019年6月,84岁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迎来自己人生的又一个重要时刻:如期转正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

一年前,得知牛犇在耄耋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肯定他“决心一辈子跟党走,这份执着的坚守令人感动”。

“一辈子跟党走”,既是对老艺术家的真情赞誉,更是对广大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